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论德国古典哲学

商务印书馆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论德国古典哲学

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史组编

商 务 印 书 馆
1972 年 • 北京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论德国古典哲学**
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史组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人民路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¹/8 字数 362 千字
1962年11月初版 1972年1月第2版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2017·58 定价：精装本 1.60 元

编者的话

恩格斯说：“没有德国哲学，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了解德国古典哲学，对于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必要的。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于德国古典哲学都有过极其深刻的分析和论述，为我们正确对待德国古典哲学遗产做出了光辉的典范。为了响应毛主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号召，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将我们过去编选的、1962年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古典哲学》一书重版印行。

这次重印，由商务印书馆的同志将全文核对了一遍，一律以最新版本的译文为准，作了一些改动。

此书主要是根据编选时已有的中文译本选编而成的，资料的来源不够完备；同时，在材料的取舍和编排体例上还存在不少缺点，希望读者批评、指教。

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史组

1971年9月

目 录

一、社会历史条件和启蒙思想	1
二、德国古典哲学的一般特点	23
三、康德.....	33
1. 早期哲学思想	33
2. 社会政治观点	37
3. 不可知论、二元论	39
4. 先验主义	81
5. 二律背反	95
四、费希特、谢林	101
五、黑格尔	108
1. 马克思、恩格斯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	108
2. 唯心主义实质	113
3. 辩证法	155
4. 黑格尔对辩证法的歪曲	238
5. 认识论与逻辑	260
6. 社会历史观	339
7. 关于自然	372
六、费尔巴哈	387
1. 马克思、恩格斯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	387
2. 政治态度	393
3. 对宗教的批判	398
4. 对唯心主义的批判	419
5. 唯物主义自然观	446
6. 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	458
7. 社会伦理思想	472

一、社会历史条件和启蒙思想

这就是前一世纪末叶的德国状况。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的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

只有在我国的文学中才能看出美好的未来。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1750年左右，德国所有的伟大思想家——诗人歌德和席勒、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都诞生了；过了不到二十年，最近的一个伟大的德国形而上学家^①黑格尔诞生了。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歌德写了“葛茲·冯·柏里欣根”，他在这本书里通过戏剧的形式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席勒写了“强盗”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但是，这些都是他们青年时代的作品。他们年纪一大，便丧失了一切希望。歌德只写些极其辛辣的讽刺作品，而席勒假如没有在科学中，特别是

^① 形而上学一词在这里是指研究经验以外的问题的哲学。——原编者注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伟大历史中找到慰藉，那他一定会陷入悲观失望的深渊。用这两个人作例子便可以推断其他一切人。甚至连德国最优秀最坚强的思想家都对自己祖国的前途不抱任何希望。

突然，法国革命象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它的影响非常大。极其无知的、长期习惯于受虐待的人民仍然无动于衷。但是整个资产阶级和贵族中的优秀人物都为法国国民议会和法国人民齐声欢呼。成千上万的德国诗人沒有一个不歌颂光荣的法国人民。但是这种热情是德国式的，它带有纯粹形而上学的性质，而且只是对法国革命者的理论表示的。但是，一俟无可辩驳的事实把理论排挤到次要的地位，一俟法国宫廷和法国人民在实践上不可能再协调下去（虽然他们在理论上的联合已为 1791 年理论上的宪法所确定），一俟人民通过“八月十日”事件实际上确立了自己的主权^①，尤其是当 1793 年 5 月 31 日吉伦特派的复亡弄得理论完全哑口无言的时候，这种德国式的热情就一变而为对革命的疯狂的憎恨了。当然，这种热情只是对 1789 年 8 月 4 日晚上贵族阶级放弃其特权这样的事件表示的，但是善良的德国人从来也沒有料到，这种行动实际上产生的后果绝不同于好心的理论家可能做出的结论。德国人从来也沒有想到要称赞这些后果，大家都知道，这些后果对于许多有关的人来说，是相当严重、相当不愉快的。所以，所有这些当初为革命欢欣鼓舞的朋友现在都变成了革命的最疯狂的敌人。他们从奴颜婢膝的德国人报刊上得到有关巴黎的、显然全被歪曲了的消息后，便宁肯保持自己那古老的安宁的神圣罗马粪堆，而不要人民那种勇敢地摆脱奴隶制的锁链并向一切暴君、贵族和僧侣挑战的令人颤栗的行动了。

恩格斯：《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版，633—635 页。

^① 1791 年资产阶级的制宪会议通过了宪法，确立了法国的君主立宪政体，这个宪法被 1792 年 8 月 10 日的人民起义所废除，结果君权被推翻了。——原编者注

总之，自宗教改革以来，德国的发展就具有了完全的小资产阶级的性质。旧的封建贵族绝大部分在农民战争中被消灭了，剩下的或者是直属帝国的小诸侯，或者是些小地主，或者是些乡居的容克地主；这些小诸侯逐渐取得相当的独立地位并在极小的偏僻的地区内仿效君主专制；这些小地主在小庄园内耗尽了自己的微产，后来就靠在小邦军队和政府办公室中找个小职位以糊口；而这些乡居的容克地主过的生活在最不讲究的英国乡绅或法国 *gentilhomme de province* [乡绅]看来都是不体面的。农业的经营方式既不是小块经营，也不是大生产，它虽然保存着农奴的依附和徭役，但决不能唤醒农民去寻求解放，因为这种经营方式本身不能使积极革命的阶级形成起来，也因为没有与这样的农民阶级相适应的革命资产阶级。

至于谈到市民，我们在这里只能指出某些特点。当时的特点是：亚麻纺织工场，亦即以脚踏纺车和手织机为基础的工业，在德国还起着一些作用，而恰恰在这个时候，这些笨拙的工具在英国已被机器排挤掉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和荷兰的相互关系。荷兰是汉撒同盟^① 中唯一在商业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成员，荷兰脱离了这个同盟，它使德国除了两个港口（汉堡和不来梅）以外同世界贸易隔绝，并从此时起便控制了德国的全部贸易。德国市民过于软弱，不能限制荷兰人的剥削。小小荷兰的资产阶级比人数众多的德国市民强大，荷兰资产阶级已有很发展的阶级利益，而德国市民却没有共同利益，只有分散的小眼小孔的利益。与利益的分散性相适应的是政治组织的分散性——许多小公国和帝国自由市。在德国，政治集中所需要的一切经济条件都不具备，怎么能谈到政治集中呢？由于每一个生活领域都软弱无力（这里既谈不上等级，也谈不上阶级，而顶多只能谈已属过去的等级和尚未形成的阶级），因此其中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能获得绝对的统治。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在德国以最畸形的、半家长制的形式

^① 参看本书第6页注①。——编者注

表现出来的君主专制的时代里，由于分工而取得了对公共利益的管理权的特殊领域，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在现代官僚政治中更为加强的独立性。这样一来，国家就构成一种貌似独立的力量，而这种在其他国家曾是暂时现象（过渡阶段）的情况，在德国一直保持到现在。由于国家的这种情况，也就产生了在其他国家从来没有过的循规蹈矩的官僚意识以及在德国很流行的关于国家的一切幻想；由于这种情况，也就产生了德国理论家不依赖市民的那种虚假的独立性，即这些理论家用以表达市民的利益的形式和这些利益本身之间的假象的矛盾。

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沒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因此当这种强有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以恐怖统治和无耻的资产阶级钻营的形态出现的时候，德国小资产者就在这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面前畏缩倒退了。

在拿破仑统治下，德国市民还继续靠他们的微小的盘剥和伟大的幻想过日子。如果举出圣桑乔所能理解的美文学材料来说，那末，他可以在让·保尔的作品中读到关于当时在德国占支配地位的小商贩盘剥精神的描写。德国市民们骂拿破仑逼得他们喝假咖啡，骂拿破仑驻兵和募兵扰乱了他们的安宁，他们把自己的所有精神上的愤慨都发泄在拿破仑身上，而把自己的一切赞扬加给英国。其实，拿破仑清扫了德国的奥吉亚斯的牛圈^①，修筑了文明的交通大道，为他们

① 典故出自希腊神话，奥吉亚斯王有大牛圈，养牛三千头，三十年未打扫。后来以此比喻极其肮脏的地方。——译者注

作了极大的贡献，而英国人却只是找适当机会去 à tort et à travers [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剥削他们。德国的诸侯也表现了同样的小资产阶级的精神，他们自认为是为维护正统原则、反对革命而斗争，其实他们只不过是英国资产阶级掏钱买通的雇佣兵。在这种普遍的幻想的气氛中，在幻想方面有特权的等级——思想家、教书匠、大学生、“道德协会”^①的会员一起带头作用，并用适合自己的夸张形式去表达普遍的幻想和对利益的不关心，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七月革命（这里我们只谈几个重点，所以中间阶段就撇开不谈了）从外面迫使德国人接受适合于发展成熟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形式。由于德国的经济关系还远远没有达到与这些政治形式相适应的发展阶段，所以市民们只把这些形式当作抽象观念、自在和自为的原则、虔诚的心愿和词句、康德式的意志的自我规定和市民们所应该成为的那种人的自我规定。因此他们比其他民族更合乎道德地和更不顾利害地对待这些形式，也就是说，他们表现出非常独特的局限性，并且他们的任何意图都没有获得成功。

最后，外国的日益加剧的竞争和德国愈来愈不能不参加进去的世界交往，迫使德国人的分散的地方的利益结合为一定程度的共同利益。德国市民开始考虑，特别是从 1840 年起开始考虑如何保障共同利益；他们成为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并开始要求保护关税和宪法。因此，现在他们差不多已经达到了法国资产阶级在 1789 年所处的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版，212—215 页。

道梅尔先生在他的耶利米哀歌里大谈其没落的那种“文化”，是

^① “道德协会”（《Tugendbund》）是 1808 年建立于普鲁士秘密的政治团体。其宗旨是唤起爱国热情，争取自己的国家从拿破仑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和建立立宪制度。拿破仑失败后，该协会由于要求宪法而被迫害，很快就瓦解了。——原编者注

纽伦堡作为帝国自由市而欣欣向荣时期的文化，是纽伦堡的工业——艺术和手工业的混合物——起着重要作用时的文化，是和德国小资产阶级同趋没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文化。如果说以前的阶级，例如骑士阶级的没落能够为悲剧艺术的巨著提供材料，那末小市民阶级当然就只能表现出穷凶极恶的软弱态度和提供一些桑科·判札式的格言和谚语的集录。道梅尔先生是枯燥乏味的失去了一切幽默的汉斯·萨克斯的后继。德国哲学痛心疾首地恸哭在它的养父——德国小市民阶级——的灵床前，这就是新时代的宗教在我们面前展示的动人情景。

马克思、恩格斯：《评格·弗·道梅尔“新时代的宗教。创立综合格言的尝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版，242页。

在英国从17世纪起，在法国从18世纪起，富有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就在形成，而在德国则只是从19世纪初才有所谓资产阶级。固然，在那时以前汉撒城市^①里也有个别富有的船主，国内也有一些豪富的银行家，可是就没有大资本家阶级，更谈不到大工业资本家阶级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创造者是拿破仑。……从那时以来，资产阶级发展得相当快，特别是在普鲁士。虽然最近三十年来它还远没有达到英国资产阶级和法国资产阶级所达到的高峰，可是它毕竟把现代工业的大多数部门都建立起来了，在某些地区清除了农民的或小资产阶级的宗法制度，多少积聚了一些资本，制造了一定数量的无产阶级，建立了相当大的铁路网。至少它把事情做到了这样一种地步：现在它要末继续向前迈进而成为统治阶级，要末就放弃自己以前所取得的成绩；也就是说，它是目前唯一能够在德国实现进步、能够治理德国的阶级。实际上它已经是德国的领导阶级了，它能不能存在，

^① 14—17世纪时，德国北部有过一个政治性及商业性的组织，叫做汉撒同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垄断德国北部的贸易。加入这个同盟的城市就叫做汉撒城市。——译者注

就要看它是否在法律上也成为德国的领导阶级。

恩格斯：《德国的制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52—53页。

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远没有英国或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富裕和集中。德国的旧式工业因蒸汽的采用和英国工业势力的迅速扩张而被摧毁了。国内其他地方所建立的、在拿破仑的大陆体系^①之下开始发展起来的较为现代化的工业，既不足以补偿旧式工业的损失，也不能保证工业有足够强大的影响，以迫使那些对于非贵族的财富和力量的任何一点增强都心怀忌妒的各邦政府考虑工业的要求。法国在五十年的革命和战争中胜利地经营了丝织业，而德国在这个时期却几乎完全丧失了它的旧式的麻织业。此外，德国的工业区少而分散；它们大都在内地，主要是用外国的——荷兰和比利时的——港口进行进出口贸易，所以它们与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大商港很少或毫无共同的利益；而最重要的是，它们不能建立像巴黎和里昂、伦敦和曼彻斯特那样巨大的工商业中心。造成德国工业的这种落后状态的原因很多，但是只要举出两个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第一是国家的地理位置不利，距离已经成为世界贸易要道的大西洋太远；第二是从十六世纪到现在，德国不断卷入战争，而这些战争又都是在它的国土上进行的。英国资产阶级自1688年即已享有政治统治权，法国资产阶级自1789年也已夺到了政权，但德国的资产阶级由于人数少，尤其是由于不集中，没有能够获得这种权力。可是，自从1815年以来，德国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断增加，而且随着财富的增加，他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断增长。各邦政府虽不愿意，却也不得不至少考虑一下资产阶级的最直接的物质利益。我们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各小邦宪法中给予资产阶级的每一点政治势力，在1815—1830年和

^① 大陆体系是指1806年拿破仑宣布的大陆封锁政策，这个政策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贸易。——原编者注

1832—1840 年的政治反动时期虽然都又被夺去，但资产阶级却得到了更实际的利益作为补偿。资产阶级每次政治上的失败，总是伴随着一次贸易立法上的胜利。当然，1818 年普鲁士的保护关税条例以及关税同盟的建立^① 给德国工商业者的好处要比在某一小公国的议会中对内阁阁员们表示不信任的那种不大可靠的权力大得多，他们在议会中的投票，只能使阁员们发笑而已。这样，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多和贸易的不断扩展，资产阶级很快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发现它的最重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由于本国政治制度的妨碍而得不到满足，如国家被三十六个意图和癖好互相矛盾的君主所任意分割，封建压迫束缚着农业和与之相联系的商业；愚昧而专横的官僚统治对资产阶级的一切事务都严加监视。同时，关税同盟的扩大与巩固，交通的蒸汽化，国内市场上的竞争的增长，使各邦各省的商业阶级互相接近，使它们的利益一致起来，力量集中起来了。这一情况的自然结果，就是他们全都转入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营垒中去，德国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力的第一次严重斗争获得了胜利。这个变化可以说是从 1840 年开始的，从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取得对德国资产阶级运动的领导的时候开始的。我们以后还要谈到 1840—1847 年的这个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运动。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版，8—9 页。

……因此，这些阶级首先联合起来反对继续保持在不同程度上伪装起来的专制政体，而他们进入反对派队伍的时刻，应该看做德国的真正革命运动的开始。

^① 1818 年的保护关税条例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国内税并且为建立关税同盟创造了条件。

确定了共同税界的德意志各邦的关税同盟，是在 1834 年由普鲁士主持成立的。后来，这个同盟包括了除奥地利和一些小邦以外的德意志所有各邦。由于必须建立全德意志市场而成立的关税同盟，后来也促进了德意志政治上的统一。——原编者注

德国资产阶级宣告反对政府，可以说是从 1840 年，即从前普鲁士国王①——1815 年神圣同盟创始者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去世时开始的。大家知道，新王不赞成他父亲的那种主要是官僚军阀性质的专制政体。法国资产阶级在路易十六即位时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德国的资产阶级也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从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手中得到。大家一致认为旧制度已经腐朽、衰败了，应该摈弃了；老王在位时人们沉默地加以忍受的一切，现在都被大声疾呼地宣布为不能容忍的事情了。

可是，如果说路易十六——“被渴望的路易”是一个平庸的无野心的蠢才，多少自觉到自己的无能，没有一定的主见，主要是依靠受教育时取得的成规来维持统治，那么，“被渴望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却完全是另一种人物。他的性格确实比路易十六更加软弱，但他却有自己的抱负、自己的见解。他涉猎了大多数科学的基本知识，因此便自以为具有足够的学识，可以对一切问题作出最正确的判断。他深信自己是第一流的演说家，在柏林没有一个商品推销员能比他更善于卖弄聪明，更善于辞令。而最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主见。他憎恨而且轻视普鲁士专制政体的官僚主义，但这只是因为他的一切同情都属于封建主义。作为所谓历史学派（该派所信奉的是博纳德、德·梅斯特尔及其他属于第一代法兰西正统派的作家们的思想）的“柏林政治周刊”②的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力图尽可能充分地恢复贵族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国王是他治域中的第一个大贵族；环绕着他的首先是一班显赫的朝臣——有权势的枢密近臣、王公侯伯，其次是许多较低级的富裕贵族。他按照自己的意志统治他

① 即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原编者注

② “柏林政治周刊”（《*Berliner Politisches Wochenblatt*》）是极端反动的刊物，1831 年至 1841 年在许多法的历史学派的代表参加下出版，受到皇太子弗里德里希-威廉（1840 年起即位为德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支持和保护。——原编者注

那些忠顺的市民和农民，作为社会各等级或阶级的无上的主宰。而各个等级或阶级都有各自的特权，它们彼此之间应该用门第的或固定不变的社会地位的几乎不可逾越的壁垒分隔开来；同时，所有这些阶级或“王国的各等级”都应该在权势方面恰好达到互相平衡，使国王能保持充分的行动自由。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过去准备实现而现在又在努力实现的 *beau idéal* [美好理想]。

不很了解理论问题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才看出了国王的真正意图。但是，国王所一心要做的和他们所需要的恰恰相反，这个事实他们却很快就看出来了。新王的“辩才”刚刚因他父亲之死而得到解放，他便用无数的演说宣布他的意图；而他的每次演说、每一行动，都使他更加失掉资产阶级对他的同情。如果不是一些严酷而惊人的现实打断了他的美梦，对这种情形他还会不大在意的。可惜，浪漫主义是不很会打算盘的，而封建主义自唐·吉诃德时代起就总是失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对于轻视金钱这种十字军后裔的最高贵的传统是承袭得太多了。在他即位时，政府组织虽然已经相当节约，但用费依然浩繁，而国库已经不太充裕。过了两年，一切节余都在朝廷宴会，国王巡狩，以及对贫困、破落而贪婪的贵族的赐赠资助等等上面用光了，正常的税收已不够宫廷和政府的开支了。于是，国王陛下很快就遭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和 1820 年法令的夹攻；1820 年的法令规定，如不得“将来的人民代议机关”的许可，任何新的公债和增税都是非法的。而这时还没有这种人民代议机关；新王甚至比他父亲更不愿意建立它；而即使他愿意建立的话，那他也不能不知道，自他即位以来，舆论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的确，资产阶级曾经一度期望新王会立刻颁布宪法，宣布出版自由，成立陪审法庭等等，总之，期望国王自己发起资产阶级获取政治权力所需要的和平革命，现在他们发觉自己错了，于是便对国王发动猛烈的攻击。在莱茵省（全普鲁士各地在不同程度上也是这样），资

产阶级的不满情绪如此强烈，他们由于本身缺乏能够在报刊上代表他们意见的人才，竟同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一极端的哲学派别结成了联盟。在科伦出版的“莱茵报”^①，便是这个联盟的果实。这个报纸虽然出版了十五个月就被查封，但可以说它是德国现代期刊的先声。这是 1842 年的事。

可怜的国王在经济上的困难，是对他那些中世纪嗜好的最尖锐的讽刺；他很快就看出，如果他不向“人民代议机关”（它作为 1813 年和 1815 年那些早被遗忘的诺言的最后一点遗迹体现在 1820 年的法令中）这种普遍要求作些小小的让步，他便不能继续统治下去了。国王觉得实施这个讨厌的法令的较好的方法，是把各省议会的常任委员会召集在一起开会。各省议会是 1823 年成立的。普鲁士王国八个省的省议会的成员是：(1) 上层贵族，前德意志帝国的各个皇族，它们的首脑是等级会议的当然成员；(2) 骑士或下层贵族的代表；(3) 城市的代表；(4) 农民或小农业主阶级的代表。各个省议会都是这样组织的：在每个省议会里总是以两部分贵族占大多数。八个省的省议会都选一个委员会，现在这八个委员会都被召到柏林，以便组成一个代表会议来投票决定发行国王所渴望的公债。据说国库是充裕的，发行公债不是为了当前的需要，而是为了建筑一条国有铁路。但联合起来的委员会断然拒绝了国王的要求，声称它们不能行使人民代议机关的职权，并要求国王陛下履行他父亲在需要人民帮助反对拿破仑时许下的诺言——实行代议制。

联合起来的委员会的会议表明，怀有反政府情绪的已不只是资

^①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自 1842 年 1 月 1 日至 1843 年 3 月 31 日在科伦出版。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立的。该报曾吸收几个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 年 4 月卡·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日报”撰稿，同年 10 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日报”也发表了弗·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莱茵日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原编者注

产阶级了。一部分农民已经站到资产阶级方面来；许多贵族也宣布反对政府，赞成代议制的要求，因为他们本身就在自己的田庄上经营大农场，并且买卖谷物、羊毛、酒精和亚麻，所以也同样需要获得反对专制政体、反对官僚制度、反对封建制度复辟的保障。国王的计划完全破产了；他不仅没有得到一文钱，反而增加了反政府的力量。此后接着召开的各省议会会议，更加不利于国王。所有省议会都要求改革，要求履行 1813 年和 1815 年的诺言，要求宪法和出版自由；有些议会的决议措词颇为不恭，国王在激愤之下所作的答复，使事态更加恶化。

同时，政府的财政困难日渐增加。有一个时期由于缩减对政府各部门的拨款，由于通过《Seehandlung》^①（它是一个拿国家作赌注进行投机的商业机关，很早以来就充当着国家的财政经纪人）进行欺诈交易，曾经维持了表面上的支付能力；增发国家纸币也起了一些作用；整个地说，财政状况的秘密保守得颇为紧严。然而所有这些计谋很快就显得不够用了。于是又试行另一个计划：设立一个银行，其资本部分出自国家，部分出自私人股东，主要的管理权属于国家，也就是说，使政府能够大量取用这个银行的资金，从而继续进行已经不能再通过《Seehandlung》进行的欺诈交易。但是，很自然，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在这种条件下投资；于是银行的章程必须改变，必须保证股东的财产不受国库的侵犯，然后才会有人认股。而当这个计划也失败之后，除了发行公债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当然，这就需要找到一批资本家，他们不要求那个神秘的“将来的人民代议机关”的允许和保证就愿意出借他们的现款。于是求助于路特希尔德，但他说，如果公债有“人民代议机关”作保，他马上就认购，否则，他就根本不打

^① 海外贸易公司（*Seehandlung*）是 1772 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的作用。1904 年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原编者注